

鸦片战争研究



张建雄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版社



定价：34.00元

鸦片战争研究

张建雄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鸦片战争研究 / 张建雄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218-06976-0

I. ①鸦… II. ①张… III. ①鸦片战争 (1840—1842)—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5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9026 号

鸦片战争研究

张建雄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柏 峰 陈其伟 张贤明

装帧设计: 韩家英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东莞市本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18-06976-0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36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序 一

现代化的城市需要历史的记忆，城市越发展，就越应该重视历史记忆的保存，无论是其实难还是荣耀。对于我们来说，城市记忆串联着珍贵的历史文化精神。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说：“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就好像站在时间的一点，惊奇地注视着过去和未来，对过去我们看得越清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多。”

东莞历史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东江沿岸已有原始人群聚居。东莞历来人才辈出、文化繁荣，是岭南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历史的跌宕起伏使东莞拥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170年前前的鸦片战争，再次将东莞推向了风口浪尖。陈连升、关天培等爱国将士在鸦片战争中英勇抗敌，感天动地，他们坚贞不屈的爱国情操已成为东莞城市精神的一部分，为东莞的历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鸦片战争使得东莞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从此中国的大门被迫向列强开放，中国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这是中国历史也是东莞历史的一段屈辱，我们固然应当牢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在屈辱中反思，在反思中前行。

170年过去了，昔日硝烟弥漫的战场已变成生机盎然的现代都市。东莞，这片浸染着英雄鲜血的热土，注定会走出一段不平凡的路。30多年前，东莞再次让世界瞩目，改革开放的大旗率先竖起在这片土地。与100多年的被动开放不同的是，这次我们是主动向世界开放，东莞由此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的企业就诞生在虎门。经过东莞人民三十多年的不断努力，东莞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农业县，一跃变成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知名城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精彩而生动的缩影。

经济建设是一个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历史和文化则是一座城市长盛不衰的魅力与个性。东莞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文化方面的建设。特别是近年来，东莞提出了建设“文化名城”的战略目标，以实现城市发展的战略转型。虎门销烟与鸦片战争历史



遗存是东莞境内的一块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理应成为东莞市文化名城建设的重要载体。历史选择了东莞，东莞就应当珍视历史的馈赠，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让文化在历史与现实间传承、在传统与现代间交融。

为了纪念鸦片战争170周年，我们特邀请全国知名学者莅临虎门参加学术研讨会，这既是学术界的一次盛会，又是东莞实施“文化名城”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与会学者们的真知灼见对东莞市的“文化名城”建设必将起到推动作用，特别是对鸦片战争历史遗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曾说：“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的鸦片战争历史遗存，需要我们竭尽全力去保护，更需要我们在保护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加强对鸦片战争的历史研究，必能让鸦片战争的历史遗存既有其“形”又有其“魂”。

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为了生活的更好留在城市。”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也恰恰正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不仅是一个巧合，更代表了人类对城市亘古不变的希冀与期待。每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让我们共同来保护并挖掘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宏伟目标。

“厚德务实，海纳百川。”东莞的发展丰富着城市的文化，文化的积淀又提升着东莞的发展。文化，让东莞成为一本内涵厚重的书，翰墨飘香；文化，让东莞成为一首韵味绵长的曲，粤韵悠扬。

王三平

2010年11月



序 二

凭吊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我们不能不回望鸦片战争。追寻中华民族的振兴史，我们也不能不追溯到鸦片战争。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历史变革中，鸦片战争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拐点，它在结束一个时代的同时，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鸦片战争，已不仅仅是场战争。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长时间走在世界前列。海陆兼具的生态环境，孕育了独特而灿烂的中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开启经济全球化的“大航海时代”，中国人的海洋活动出现了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历史机遇。然而，大陆思维的王朝体系在收复台湾之后放弃了东出海洋的选择，在闭关锁国中逐渐脱离了世界发展潮流。1840年，当中国在海上“岛夷”炮火的轰鸣中再次面对世界，失去了原有的大气和从容，品尝的只是海水的苦涩，拥有的只是挨打和被动。旧的格局在战争中分崩离析，新的秩序在动荡中逐渐建立。从此，民族独立和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主题。

对鸦片战争这段历史的研究历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在诸多学者的潜心研究下，研究的视角不断开拓和创新，一批学术含量深厚的专著、论文陆续出版或发表，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学者逐步加入到鸦片战争历史研究的队伍中来，研究领域逐渐拓宽，研究深度不断延展。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工作虽然时间长久，但活力依然不断，可谓历久弥新。史学的发展永无止境，史学工作者的使命任重道远。研究过去，贡献当代，展望未来。立足于时代需要是史学的生命之源、发展之路，任何时代的历史学家都要践行那个时代的社会责任。

“纪念鸦片战争170周年学术研讨会”是对近年来鸦片战争历史研究最新进展的一次



汇报，是学界同仁进行学术交流的一次绝好契机。本次会议得到了全国各地学者同仁的积极支持与参与，共收到学术论文二十多篇。会议围绕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的演变、鸦片战争期间的军事与政治、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出现一些新亮点。如对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840年的问题重新进行了科学的考证，对鸦片战争与中国的觉醒做新的诠释，对鸦片战争前后官方关系、地方社会变迁做新的考察，对中英火箭、火炮与英国战船做技术史的比较研究，对英国输华棉花与鸦片贸易地位的互换、粤闽浙海盜问题提出了新看法。在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的史料整理、考究上有所进展。从外国文献中发掘出林则徐的轶文，显示鸦片战争史资料的整理还有很大的潜力。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纪念鸦片战争，不是为了铭记仇恨，而是为了增强忧患意识、加强自身反思。忘记历史的民族不会有前途，没有反思的民族不会有进步。

站在伶仃洋畔，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昔日的古炮台已是游人如织。但看着岸边那锈迹斑斑的古炮口，耳畔仿佛依然回响着枪炮的轰鸣。

2010年11月



目录

序一·····	王道平/ 1
序二·····	杨国楨/ 3
关于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几点思考·····	萧致治/ 1
鸦片战争与中国觉醒	
——纪念鸦片战争 170 周年·····	林家有/ 12
略论张集馨与林则徐、琦善·····	周新国/ 23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官民关系的蜕变·····	姜 涛/ 30
黑白颠倒：英国输华棉花与鸦片贸易地位的互换·····	郭卫东/ 37
再论耆英外交·····	李少军/ 50
近代禁毒杰出代表唐国安述略·····	苏智良 刘效红/ 65
林则徐鸦片战争时期佚文评介·····	吴义雄/ 72
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	王宏斌/ 84
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前装滑膛火炮的材质及其对性能的影响	
·····	孙淑云 刘鸿亮/ 93
鸦片战争前后的粤闽浙海盗·····	邵 雍/ 133
太阳正照耀着走上复兴之路的中国	
——鸦片战争 170 周年祭·····	林 岷/ 146
鸦片战争后香港的主要中外报刊·····	李谷城/ 150
国省财政关系与清末禁政进程	
——清末禁政环境研究断想·····	刘增合/ 162



鸦片战争与广州十三行	冷 东/172
鸦片战争时期的侵华英军战船技术	张建雄/180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与广州学海堂学长	黄健敏/199
东南亚鸦片市场的变迁（1500—1900）	连 东/208
清季诗歌中的鸦片战争与江南社会	朱季康/219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丛报》与香港	赵 莹/229
评述林则徐防固澳门举措	唐立鹏/242
试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虎门海防要塞	曲庆玲/252
鸦片战争时期水勇的招募与裁撤	丁学志/263



关于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几点思考

萧致治

中国近代始于 1840 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早已是国内史学界的共识。但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仍不断有人否定 1840 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提出自己的主张。30 年来，围绕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篇文章：

1. 牟安世：《试析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及其上限》，《学术月刊》1987 年第 2 期；
2. 高升斗：《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是同盟会的成立》，《理论探讨》1988 年第 4 期；
3. 殷方勇等：《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争鸣》1990 年第 1 期；
4. 徐立亭：《评中国近代史开端说》，《史学集刊》1991 年第 3 期；
5. 刘光永：《中国近代史上限异说》，《甘肃社会科学》1994 年第 3 期；
6. 许苏民：《“内发原生”模式：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为明万历九年（1581）》，《河北学刊》2003 年第 2 期；
7. 李殿元等：《中国近代史上下限新论》，《文史杂志》2005 年第 2 期。

以上 7 篇文章，除牟安世、徐立亭坚持中国近代史开端为 1839 年 9 月或 1840 年外，其余 5 篇都否定 1840 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理由各不相同，概括起来有下列三个基本观点：

1. “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首要标志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因此，有无资本主义萌芽，乃是论定近代史开端问题的关键。”“大量的事实证明，自 16 世纪后期起，中国社会确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社会开始其近代转型的过程中，1581 年是具有关键性的，故笔者拟把 1581 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许苏民）

2. “鸦片战争后，中国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1861 年辛酉政变后，“清王朝的政权性质由原来的封建政权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其国家统治形式也产生了变化”，“以 1861 年辛酉政变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比以 1840 年鸦片战争为标志较为合适”。（殷方勇等）



3. 把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有悖于‘近代’这一历史概念的科学含义。从中国和世界各国历史演进的共性说，应该把孙中山先生建立中国同盟会的 1905 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高升斗）或者认为，“历史学上公认近代史应当指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各国近代的开始，如英、法、美、俄、日等，无不是以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取得成功而作为起始时间的，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封建君主政权的结束。”因此，“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应当是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李殿元等）

以上几种观点都不认同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考察其根源，笔者认为，大多是由于对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及其后果所引起的社会巨大变化认识不足，片面强调自己看到的某一方面，无视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质的变化。他们或者夸大了鸦片战争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水平，从而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提前到 1581 年；或者强调世界各国近代史的同一性，忽视了中国近代史的突出特性，因而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推迟到 1905 年或 1911 年。再就是过分强调 1861 年辛酉政变，忽视了 1840 年到 1860 年间产生的社会巨大变化，从而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推迟至 1861 年。为此，下面拟结合中国近代的历史实际，谈谈个人的几点思考。

一、鸦片战争后 20 年的巨大变化，足证中国近代史始于 1840 年，而非 1861 年

主张 1861 年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开端的作者，强调“鸦片战争后中国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1861 年后，清王朝的政权性质才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其国家统治形式也产生了变化”。这种论断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到表象，未洞察实质。实际上，清朝统治当局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一再失败，在西方侵略者面前，已经演变成一只任人摆弄的羔羊，表面上虽然政权还维持独立的状态，实际上他们十分惧怕战争再起，威胁他们的统治。所以，在鸦片战后与各国的交涉中，无不处处顺从，凡事迁就。众所周知，清政府和英国签订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在“不许更改一字”的屈辱条件下签订的。紧随英国之后，美国跟踪而至。其特使顾盛，认定清政府已被鸦片战争吓破了胆，于是威胁与讹诈交替使用，很快就迫使清政府与他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内容不仅包括了英国掠得的各项权益，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所扩大。特别是“利益均沾”的规定，更是贻害无穷。按照这一条款，此后任何一个国家如从中国掠得新的权益，他都可依据“一体均沾”的原则，很轻易地享受同样权益。继美国之后，法国也很快与中国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除充分享受了英美掠得的一切权益外，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如促使清政府对天主教弛禁。这一规定表面上看来，允许外人在华传教，并无不妥。可是，此后几十年中，天主教徒依据这一条款到处招摇撞骗，由此发生了一系列“还堂案”和“教案”，民教相仇，不可收拾。此后，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丹麦、西班牙、普鲁士



(即后来的德国)均相继派遣使节来华,要求与中国缔约通商。清政府为了避免新的纠纷,无不本着“一视同仁”原则,允许他们在各通商口岸通商,享受英美等国同样的权益。特别是瑞典挪威联盟的使臣李利华来华后,向美国使者请教。美国特使即把《望厦条约》的汉文本及通商税则送给他。李利华即以《望厦条约》为蓝本,拟定《中瑞挪条约草案》,“只将国名更换,其余一字不易”^①,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即获得了与美国同样的权益。这样,鸦片战争后仅经过5年时间,中国的大门几乎全向欧美各国开放了。中外关系通过这一系列条约的签订而确定下来的变革,是两千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试问,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采取百依百顺的态度,不分外国大小强弱,一律许以各种不平等特权,还能称得上“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吗?”

其次,从国家领土完整来看,鸦片战争后失去的领土大得惊人。领土完整是保持一个国家独立的基本标志。鸦片战争后,先是香港被英国割占,接着是葡澳总督亚马勒以为清朝软弱可欺,竟然驱逐清朝驻澳门的官员,封闭澳门海关,拒绝缴纳地租,将澳门据为己有。道光皇帝一直以未能保守祖宗传给他的领土视为莫大耻辱,临终还谕令他的墓地要残缺一角,以昭示后人要牢记失地教训。可是,在咸丰皇帝统治时期,英国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又割占了香港对岸的九龙司。特别是沙皇俄国,早就有侵吞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的野心。鸦片战争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即于1847年任命狂热侵略分子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亲自授意他放手侵占我国的黑龙江地区。穆拉维约夫一上任就着手筹建一支庞大的外贝加尔哥萨克军,作为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1850年8月,受穆拉维约夫派遣的涅维尔斯科伊强占了黑龙江口的庙街。到1853年,沙俄已完全霸占了中国的黑龙江口地区,并悍然下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1854年至1857年6月,穆拉维约夫不顾清政府的抗议,先后4次派军队非法闯入黑龙江,在左岸建立了许多军人“村屯”。1856年12月末,沙俄悍然宣布成立以庙街为中心的所谓滨海省,明目张胆地将中国的黑龙江下游划入该省。同时施展阴谋诡计,企图逼迫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天津海口大沽,穆拉维约夫乘机率领兵船直趋瑗珲,于5月28日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瑗珲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割归俄国,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中国领土则归中俄“共管”。据此,沙俄侵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原属中国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40万平方公里则由中俄共管。1860年10月10日,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乘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机,借口“调停”,逼迫清政府议和代表奕訢向英法屈服,相继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然后借口调停“有功”,于11月14日,逼迫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不仅强迫清政府承认《瑗珲条约》,还把所谓“共管”的乌苏里

^① 耆英:《瑞典挪威请照美国原定条款之约通商业已照缮约册盖用关防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六,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084—3085页。



江以东约 4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由此，我国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就被沙俄强占了，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愤慨地指出：“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① 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② 在鸦片战争后的 20 年间，竟然丧失了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土地，这在有史以来的中国，也是少有的。

除了中国的领土被大片侵吞外，还有许多独立主权同样受到严重侵害。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就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按照国际法及中国过去的法律，外国人在中国的领土和领海里犯法，应该由中国的司法部门审理和判决。而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 13 款规定，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犯罪，中国政府无权依法审判，而要由英国领事根据英国法律定罪。到了中美签订《望厦条约》，领事裁判权又有扩大。该约第 25 款规定，美国人之间以及美国人与任何其他外国人之间在中国发生诉讼，“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又如《虎门条约》规定，准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盖房，永久居住，成为日后外人在各通商口岸建立租界的张本。后来各地的租界实际变成“国中之国”，变成罪恶的渊藪，就是肇源于此。再如《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准许英国派兵船一只在各通商口岸驻守，致使外国兵船可以自由进出中国领海。而中美《望厦条约》第 32 款又规定，美国兵船可以任意到中国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第 26 款规定，美国贸易船只进中国五港口湾泊，“中国无权管理”。凡此都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海权。《望厦条约》第 19 款还规定，清政府对在华美国人必须“时加保护，令其身家安全”。这个规定似乎理所当然，但后来却贻害无穷，变成美国侵略者在中国为非作歹，人民却无权反抗。否则，清政府必须派拨兵役弹压，“按例惩办”。所有这些，无不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而追根求源，都是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英美等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了种种通商特权，为资本主义各国在华推销商品、收购原料，大开方便之门。在中外贸易中，关税自主权既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对于维护经济独立尤其重要。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第 10 款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已使中国失去了税收自主权。1943 年中英所签订的《通商章程》，基本全盘接受了英方提出的方案。在表列的进口货 115 种中，新税较旧税提高的只有 14 种，都是极不重要的商品，其他都有下降。出口货所列 89 种商品中，只有 27 种极不重要的商品略有提高。进口货如最重要的棉花，税率降低 19.63%，棉纱降低 7.82%，洋布降低 22.88% 至 35.68%，六种毛织品平均降低 38.98%。经过几次要挟，进口税规定一律以值百抽五为原则。1858 年修改的税则，又是基本上接受了洋税务司李泰国提出的草案。在 176 种进口商品中，有 77 种税率不足 5%；174 种出口商品中，有 97 种税率不足 5%。到了 1858 年 11 月，中英双方在上海通过《通商章程善后条款

①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41 页。

②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7 页。



海关税则》，税率又有所降低。进口棉花降低 0.82%，斜纹布降低 2.84%，印花布降低 9.27%，棉纱降低 2.08%。如果和英美本国的进出口税率比较，更明显地显示了这种低税率的半殖民地特性。1859 年，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互惠税率协定。英国以减低法国酒的进口税为条件，从每公担 159 法郎减低到 27.5 法郎，才换得法国减低英国各种麻、棉、毛织品的进口税，而且平均税率仍然达 15%。这种税率相当于中国同类货物进口税的 3 倍。如和美国进口税率比较，1860 年，美国进口税率为 15.67%，而中国则只有 5%。^① 在国与国之间贸易，税率对保护本国商品具有特别重要作用。中国的进出口税既然远远低于西方各国，中国的产品又怎能与他国竞争！

更有甚者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关于子口税的规定，特别有利于外国商品销遍全国。1858 年，中英《天津条约》第 28 款规定，子口税统一在一口缴纳，“其内地货则在路上首经之子口输交，洋货则在海口完纳，给票为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据”。税率定为货物值百两征银二两五钱。此后，凡洋货进口，只需征收 2.5% 的子口税，就可销遍全国各地。这就更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而洋商从内地贩运土货出口，不论远近，也只在首口纳 2.5% 的子口税。华商在内地贩运同样货物，则需“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两相比较，别如天渊。华商又如何能与洋商竞争？这种税制，难道还未显示出半殖民地的特色吗？

还有海关，原属一个国家的大门，理应由本国人员管理。可是，在中国，从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海关的管理权就逐渐落入外人之手。最先被侵夺的是上海的江海关。1853 年 9 月，小刀会乘太平天国攻占南京之机，起义占领上海。一时海关处于瘫痪状态。次年轻苏松太兵备道兼江海关监督吴健彰与英、美、法三国领事协商，达成八点协议。主旨为建立一个华洋官员的混合机关。协议中规定，设立外籍税务司 3 名，由英美法各派一名。由于英国派的威妥玛懂汉语，被推举为总税务司。实际上，税务司成了威妥玛一个人的办事机构。1855 年 6 月 1 日，另一个英国副领事李泰国接任江海关税务司。从此，上海江海关的管理权一直掌握在英国人手中。1858 年 11 月，中英在上海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 10 款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1859 年 6 月，李泰国提出，北京应创立一个特殊机关以处理对外事务。这个机关就是后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年 9 月，李泰国受命办理各口海关行政，自称“总税务司”。开始在各通商口岸建立以洋人为税务司的海关管理体制。1861 年 1 月 20 日，清政府根据李泰国的建议，在北京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奕訢、桂良、文祥等管理对外交涉事务。总理衙门成立的第二天，就明令李泰国为总税务司。李泰国从此成为清政府的国务顾问。不久，李泰国因病回英国治疗，总税务司由费士莱代理。费士莱把海关税务司制于 1861 年推广到镇江、宁波、天津、福州、汉口和九江。1862 年后，又推广到厦门、芝罘、淡水、打狗、

^① 本节参考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4—216 页。



牛庄等地，从此海关大门皆控制在外人手中。后来，英人赫德继任总税务司，执掌海关大权 45 年，不仅一手控制了全国海关行政，而且参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各方面事务，成为左右清朝政局的关键人物。

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种种通商特权，把商品和鸦片源源输入中国，在社会经济方面造成日益严重的祸害。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吹嘘，他为英国工商界的生意打开了新世界。英国工商界“一想到和三亿或四亿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都发了疯似的”。^①紧接着鸦片战争结束，英商就把大量工业品运往中国销售。据统计，英国输华货物总值，1843 年度为 1456180 英镑，到 1860 年度达到 5318056 英镑，为 1843 年度的 3.6 倍。同样，美国对华贸易总额，1845 年度是 9562 千元，到 1860 年度增到 22493 千元，等于 1845 年度的 2.35 倍。另外，贸易中心逐渐由广州移到上海。出口贸易方面，茶和丝一直是出口大宗，增速也相当快。1843 年度，上海出口茶叶为 1149 千磅，1857 年度增到 51317 千磅，14 年间增长 43 倍。华丝出口，1844 年度是 6433 担，1857 年度增到 66391 担，等于 1844 年度的 10 倍多。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侨居中国的欧美人日渐增加，鸦片战争前的 1837 年为 307 名，1843 年为 382 名，1859 年增到 2148 名。十多年间增加了 5 倍。

正当贸易之外，罪恶的鸦片贸易也得到大发展。鸦片战争本来由于英国顽固坚持鸦片贸易而起。可是，《南京条约》却对鸦片贸易只字未提。战后，鸦片大量走私进口，远远超过战前水平。据各家考证，战前十年，每年平均输入鸦片不超过 25000 箱。战后，1843 年为 36699 箱，1851—1858 年，平均每年输入 56946 箱，增加了 1.2 倍。鸦片走私范围除了通商口岸，非通商口岸也广泛走私鸦片，香港则成了鸦片走私中心。在广州，“鸦片就在街道上公开运送，并且像非违禁品一样的销售”。^②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鸦片贸易在平衡中外贸易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847—1848 年间，中国和英美的合法贸易，中国合计出超 1600 万元。但那时，印度每年输华鸦片值是 2300 万元。由于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由出超国变成入超国，每年入超 700 万元。1858 年 11 月，在修订的《海关税则》中，鸦片改名“洋药”，每箱在通商口岸缴纳 30 两的进口税，即可合法入口。鸦片贸易从此合法化。由此，鸦片贸易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祸害。

西方侵略者还肆意于东南沿海拐卖人口，侵犯中国人权。西方殖民者掠夺华人出国做苦工，虽然肇源于鸦片战争前，而大肆贩卖，则为鸦片战争后的事。据估计，1801 年至 1850 年，被拐骗出国的华工约 32 万人，1851—1875 年达 128 万人。自 1801 年至 1925 年，总计达 300 万人。这些被拐骗出国的华工，运往东南亚各地的称“猪仔”。从拐卖到

^①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9 页。

^② [美]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609 页。



贩运的全部支出，每名约花 20—40 元，在新加坡出卖，每人可卖 90—100 元，获利在一倍以上。运往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澳洲等地的称“苦力”。鸦片战争后才开始这种罪恶勾当。1847 年，西班牙人从厦门运载 800 名华工去古巴，1848 年，又从厦门运送 75 名华工去秘鲁。此后连年从厦门、香港、澳门等地装运华工去秘鲁。当时从中国运往古巴、秘鲁的苦力，包括船票、饭食等，约花费 150 元，而运到古巴、秘鲁卖给雇主，一般可卖 400—500 元。有的高达 1000 元。1860 年，中英、中法签订《北京条约》，承认英法在华有招工的权利，实际就是把掠拐华工合法化。被拐骗的华工，从受骗那一刻起，就失去人身自由，受尽了虐待和迫害。他们住宿猪仔馆，无异住进了牢狱。英国驻广州领事供认，“苦力贸易是以最坏形式出现的奴隶贸易”。^① 苦力被强迫运往目的地，更是惨无人道。途中受尽折磨，死亡率极高。1856 年，英船“仆得兰公爵”号装运苦力 332 名，由香港运往古巴，中途死亡 128 名，死亡率达 39%。同年，“加尔文”号装 298 名苦力去古巴，途中死亡 135 名，死亡率高达 45%。^② 这种运输船被人们形容为“浮动地狱”。华工到达目的地的苦难，也是数不清、说不完。登岸后就被关进栅栏，脱光衣服，任凭雇主挑选。到了劳动场所，每天强迫做工 11—16 小时。古巴华工契约期间死亡率达 75%，一般劳动寿命只有 5 年。古巴甘蔗园里的苦力，惨死之后骨头还要和牛马骨头一块烧成灰，用来提炼白糖。殖民者把苦工的血榨干后，连他的骨灰也不忘利用，实在是可恶至极。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原来的经济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首先受到冲击的是 5 个通商口岸及其周围地区。如上海附近的松江、太仓、苏州一带，手工纺织业向来发达。上海开埠，外国商品涌入周围地区，致使这些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开始解体。1846 年，包世臣记述当地的情况说：“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较稻田倍蓰。虽横暴尚可支持。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削减大半。”^③ 广东是最先受到冲击的地区，据咸丰三年（1853）的《顺德县志》记载：“自西洋人以风、火、水、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④ 厦门的情况也是如此。“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变（售），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⑤

鸦片战后，由于茶、丝大量出口，刺激了茶丝业的发展，促进了茶丝商品化。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江苏的种茶养蚕业均有很大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对中国的自然经济起着分解作用，并表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走上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道路。夏燮在《中西

①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74 页。

② 严中平：《“浮动地狱”里的滔天罪行》，《严中平文集》，第 109 页。

③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493 页。

④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506 页。

⑤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491 页。